

DOI: 10.19411/j.cnki.1007-7030.2019.04.012

# 朱素臣《十五贯》传奇的文化解读

杨 惠 玲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朱素臣的《十五贯》并非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公案剧,其重心不在两桩冤案,而在于生命个体尤其是寒门士子的生存境遇。作者寄寓其中的,不仅是惺惺相惜的关怀,更是无力主宰自我命运的叹息。通过反映家族、婚姻、礼乐和司法等制度对两对年轻人造成的重要影响,该作细致入微地揭示了皇权时代这些社会制度是如何作用于古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与行为方式,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他们的性格和德行,也决定了他们的命运和境遇。

**关键词:**《十五贯》;家族;婚姻;礼乐

**中图分类号:** J8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030(2019)04-0103-08

作为昆剧史上影响深远的作品,《十五贯》已得到学界较多的关注。笔者在中国知网搜索到1956—2018年间研究《十五贯》的论文101篇,其中,80多篇针对的是浙江昆剧院于1955、1956两年改编演出的新版,着眼于原著的只有10来篇。这些论文中,除了探讨素材的流变和人物的刻画,还有是从司法的视角挖掘其文化内涵<sup>①</sup>。笔者认为,朱素臣的《十五贯》传奇不仅文学性与舞台性两擅其美,还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是浙昆新版无法取代的。在司法之外,该作细致入微地反映了家族、婚姻和礼乐等制度对生命个体造成的重要影响。这些内容直接关系到剧中人物活动的社会环境,故事发展和人物性格形成的内在逻辑,作者对人生与社会的体察等。本文将以此文本细读为基础,探讨这一关系,以便更加细腻、深入地理解作者的用心与剧作的价值。<sup>②</sup>

—

自周朝以降,中国长期推行宗法制,家族在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非常重要。秦以后,这一制度与皇权制、官僚制三位一体,构成了中国社会制度的基本框架。再加上婚姻、礼乐、司法和科举等制度的维系,中国社会形成了超稳定结构。这一结构中,家族本位与官本位二者并存、结合,对中国人的观念世界和行为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十五贯》传奇中,作者以家族情感与观

**收稿日期:** 2019-03-2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明清文士戏曲编刊活动研究”(17YJA760069)

**作者简介:** 杨惠玲,文学博士,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戏曲研究。

①如潘志勇《昆曲〈十五贯〉的中国司法传统解读》,《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2期;李伟、姬杰辉《戏曲作品中的传统证据文化探析——以昆曲〈十五贯〉为例》,《牡丹江大学学报》2017年第8期;刘娅《中国古代刑事冤案发生原因探析——以古典戏剧〈十五贯〉为中心的考察》,《南海法学》2018年第5期。

②该作现存最早的本子是清顺治七年(1650)抄本,不过,学界对该版本产生的年代尚有争议。在发现确凿的材料之前,笔者仍将该作的创作年份定于明末清初。本文所引曲词和念白皆出自这一版本,不另外出注。

念作为塑造熊氏兄弟的重要依据，颇为典型地反映了两个本位结合的途径和形态。

双生双旦的脚色组合是该剧的特点之一，由双生扮演的熊氏兄弟是作者着墨最多的两个人物。在第一出，作者将他们比作东汉末年德才兼备且颇有时名的陈纪和陈谌两兄弟，确定了剧中人物的基调。第二出《泣别》，兄长熊友兰一出场便感叹“衰宗未振，一身长抱终天恨”，吐露了重振家声的迫切心愿。熊氏“诗书承荫，孝友家传”，乃书香门第。但是，熊友兰的父母已经去世，也不见有祖父、叔伯父和堂兄弟等。他和弟弟熊友蕙既没有功成名就，也未成家立业。家徒四壁，日趋困窘，甚至到了衣食不周、难以为继的境地。一个“衰”字，揭示了他们寒门士子的身份和困境，其背后是强烈的家族责任感。第十二出《狱晤》，兄弟俩突然相遇于死囚牢房，大放悲声：“好宗枝已斩绝”；又反复追问：“问全孝友那一节？”尽管家族已经衰微，兄弟俩仍用“好”来评价，体现了他们深厚的情感。然而，他们一旦被处死，熊氏的血脉便戛然断绝。他们认为自己有负重任，自责不已；又深感命运的不公，悲愤难抑，相约“枉死城幽魂共摄”，“森罗殿哀词共诉”。一方面，兄弟俩身处逆境，仍坚守节操，不坠青云之志，却无端卷入凶案，身心遭受巨创，行将引颈就戮。如此不幸，已经是极为悲惨，却还要承受如此沉重的思想包袱，这就大大强化了熊氏兄弟的不幸，悲剧意味更为浓烈；另一方面，这些描写再一次凸显了人物的家族责任感。很显然，家族情感与观念是兄弟俩精神世界的重要基石。

第二出《泣别》，兄弟俩举目无亲，生计凋零。哥哥熊友兰决定放弃学业，外出谋生，让弟弟友蕙在家读书，引发了兄弟之间的一场争执。哥哥的理由主要有两点：1. 他“年纪稍长，筋骨颇坚”。2. “吾弟资性聪明，远过愚兄百倍。异日功名之事，所望吾弟不小”，希望其弟“恒心力学，显祖扬名”。而弟弟熊友蕙则希望哥哥留在家中，由他外出，其理由主要也有两点：1. “虽则阉然一躯，但哥哥做的事体，料兄弟也还做得”。2. “哥哥，你乃熊门长子，宗社所关，有事服劳，原系子弟职分；自然哥哥在家读书，兄弟出门才是”。兄长既疼爱弟弟，又把光耀门楣的希望寄托于他，甘愿舍弃自己的前途。而弟弟，也对兄长敬爱有加。按照宗子制，嫡长子一般不外出做官或从军，而是留下来主持家族事务。随着时代的变迁，宗子制逐渐被族长制取代。族长及其助手的产生常常无需通过宗子制，而是由部分有话语权的族人协商遴选的结果，担任族长的不一定是嫡长子。尽管如此，仍然有很多家族很看重嫡长子。在第二十五出《拜香》，熊氏兄弟猜测况钟在外做官，“须有世兄在家”，其依据便在于此。熊友兰是长子，熊友蕙便以此为理由，试图说服哥哥。很显然，两人的出发点和目的是共同的，他们都愿意独力承担起养家的责任。在宗法时代、人情社会，兄弟俩身处势单力薄的家族，内无多余的资财，外无亲友的接济。求学、谋职、应试、求官等，也都孤立无援，寸步难行，处处受制于人。他们在看惯世态炎凉的同时，早已懂得家族势力的重要性，对家族本位的理解和接受自然比其他人更为充分。因此，基于兄弟情义，也为了家族的重振，他们都愿意付出和牺牲。家族情感与观念已经渗透到熊氏兄弟的骨髓，成为决定他们言行的重要准则。

第二十三《谒师》，兄弟俩平反出狱后，参加乡试，双双考中。他们颇感“寒灰重热受恩深”，去拜谒房师过于执。过于执一再道歉，承认自己“才学短，失误深”，“一发惭愧无地”；但是，兄弟俩却竭力为过于执开脱责任：“只算胥靡无状”，“老师说那里话来？当日之事，皆系夙孽所招”。为了减轻过于执的负罪感，他们把责任统统推给了胥吏和因果报应。甚至，他们感恩戴德，竭力称颂：“蒙老师谬加知遇，与荐明经，此恩此德，诚为千古不朽矣。”过于执是冤案的主要责任人，曾使兄弟俩饱尝折磨。然而，他们非但没有心存怨恨，反而感激涕零，其原因是什么？主要不是因为过于执真心悔过。兄弟俩孤苦伶仃，早已习惯受冷落，遭欺凌，一旦得到他人的支持和提携，很容易被打动。更重要的是，科举、入仕是寒门士子实现家族本位的必经之途，而他们认为自己是“鸡肋庸材，樊笼弱质”，蒙过于执垂青，才侥幸得到进入仕途和晋京赴试的

资格，向改换门庭的理想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可见，“千古不朽”的颂词背后，潜藏的是熊氏兄弟根深蒂固的家族责任感，无论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即使是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在剧终，熊氏兄弟联登两榜，得授官职，又与况钟义女喜结秦晋，家族本位与官本位得以完美结合。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家族情感与观念在熊氏兄弟的成长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促使他们养成了端方不苟、积极进取、宽容大度、知恩图报，又重视骨肉亲情等性格，以及甘愿为对方牺牲和奉献的精神。

当然，兄弟俩的性格也有差异。因为长幼有序，兄弟俩的责任感并不完全一样。由于父母双亡，家族的重担早就落到了熊氏兄弟尤其是兄长身上。相比之下，兄长感受到的压力更大。他必须面对三餐不继的现实，想出应对之策。因此，他当机立断，找好了活计。而弟弟，依然执着于“向来学问之士，无恒产而有恒心，但谋道而不谋食”的信念，期待“天神助供，螺女代炊”，反对兄长的决定：“我兄弟每一意读书，岂为饥寒改节？不激不发，哥哥且免愁烦。”很明显，兄长更加理性、稳重、周到、细心，做事深思熟虑，也更果断坚决。正因为如此，他才在临行前叮嘱弟弟“须把书室迁进内一间去”，原因是“此处隔墙，贴近冯家内室，他有少妇在家，声息相闻不雅”。而弟弟涉世未深，单纯、天真，不谙人情世故，行事往往欠考虑。这样的性格差异使得后来故事的展开显得合情合理，如第四出《得环》和第六出《饵毒》，弟弟独自在家，既无兄长提醒，也没有其他亲友可以商量，于是做了傻事，加重了冯玉吾的疑心，和冤案的发生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再如第二十一出《请罪》，众邻居陪同冯玉吾上门请罪，熊友蕙虽然愿意原谅，但仍心存芥蒂；而熊友兰则显得更为洒脱大度。这是因为“东阁招贤日，碧桃高折时”即将来临，蟾宫折桂、显亲扬名的目标有望实现。与此相比，其他的一切都不再重要。可见，他对家族本位的理解更为透彻，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更显成熟、大气。

由上可见，家族制度是打开《十五贯》传奇的一把钥匙。一方面，作者立足于家族情感与观念刻画熊氏兄弟的性格特征，又以其性格为推动故事发展和矛盾激发的内在原因。人物栩栩如生，又感人至深；故事环环相扣，且一波三折。另一方面，作者通过熊氏兄弟凸显寒门士子的生存困境，倾吐了怀才不遇、沉沦底层的悲郁之情；而熊氏兄弟的圆满结局又透露了其内心对功名富贵的向往。在某种程度上，熊氏兄弟是作者的一个影子。可见，该剧叙写的，不仅仅是传奇故事，也是寒门士子的命运与境遇。

## 二

由双旦扮演的苏戍娟和侯三姑是剧中的女主人公。她们与熊氏兄弟既有着神奇的缘分，又品貌相当，志趣相投，故而能终成眷属。但是，影响其性格形成并发展的重要因素不是家族情感和观念，而是当时的婚姻制度。

苏戍娟的身世较为复杂，很可能是庶出之女。第五出《摧花》，苏戍娟上场时自称“原系锡山名家之女”。第九出《窃贯》，她又提及自己“本是旧族，原非下乘”。她的原生家庭即使不是高门大户，也是颇为体面的。既然如此，苏母为什么离开名门，带着女儿嫁给一个因贫穷迟迟不能娶妻的屠夫？笔者认为，苏母很可能是出身卑微的妾妇，未曾生子，在丈夫去世后，不为夫家所容，被逐出宅门，无以为生，只好委身游二。中国古代很重视婚姻，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纳妾只是正式婚姻的一种补充，通常不经过聘娶仪式。妾妇大多来自小户人家，地位低下，虽然要承担生儿育女、延续家族血脉的责任，但不被视为家庭成员，与丈夫及其正妻属于主奴关系，没有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妾妇又分为多种，陪嫁丫鬟等次最低，有时甚至还不如家中的丫鬟。很明显，纳妾制度只保障男性的权益，苏母身陷其中，不仅自身受践踏，被剥夺，无力挣扎，随波逐流，还将不幸带给了年幼的女儿。

在剧中,苏戍娟对自己的出身交代得很含糊,原因在于她为亲生父亲的身份与地位感到骄傲,又不愿承认被原生家庭驱逐的尴尬现实。由于生父和继父身份的差异带来的心理落差,她难以融入新家。母亲撒手人寰后,留下她孤零零一个人,无依无靠。作为在夹缝中挣扎的名门弃女,苏戍娟形成了与众不同的品行,敏感、清高、自尊、要强,有主见,不愿听天由命,但又无所归依,只能留在游家,不仅清寒度日,还要遭受继父的打骂。因此,她感慨自己是风中絮、笼中鸟,时时自怜自叹。一方面是身不由己,另一方面是不甘沉沦,在矛盾中痛苦不已的她常常试图抗争。然而,她不过是一介闺中女子,能反抗的只有继父。因此,她不肯低眉顺眼,常常和继父发生争执。继父威胁说要将她卖给盐商,引发了她深深的焦虑和恐惧,捶胸顿足,悲愤难抑。凶案发生前夕,继父开玩笑说已将她卖给华府做陪嫁丫鬟。她信以为真,是因为深深了解为人妾妇的不幸,唯恐重蹈母亲的覆辙;而且,她也不愿接受继父带给她的底层身份,一心希望摆脱。做大户人家的陪嫁丫鬟,这是她万万不甘心的。除了逃到姑母家寻求保护,她别无选择。可见,游二被害并不是一句玩笑话引发的血案,其中包含着微妙的社会文化心理,反映了作者对生活和人性细致而深入的体察。

毫无疑问,苏戍娟是不公平的婚姻制度的受害者,应该同情。但是,对于冤案的发生,她也有一定责任。游二虽非宅心仁厚之人,平日好酒贪杯,焦躁、易怒,但并不是十恶不赦之徒。姐姐游氏苦口婆心地劝说,答应资助他开肉铺,他马上转怒为喜,开心得像个孩子;从第九出的描述来看,他和秦古心等邻居关系很融洽,说明他平日待人并不差;有了做生意的本钱,很高兴,就和戍娟开开玩笑,说明他心里是认可这个女儿的。他就是一个普通人,没有文化,见识不多,心机也不重。脾气确实不好,但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生意失败,生计艰辛,压力沉重。然而,因为强烈的排斥心理,苏戍娟没有能够站在继父的角度,感受挣钱糊口的不易,更没有像其他贫家女子一样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分担养家的责任。她所感受到的,只是自己的委屈和不幸。她过于执拗,有些偏狭,甚至是自私。不应否认,她的这些不足也是导致游二被杀的原因。可见,母亲两次婚姻造成的伤害对苏戍娟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她性格中的优长与不足都与之密切相关。

与苏戍娟相同的是,侯三姑容貌秀丽,人格高洁,但受制于当时的婚姻制度,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侯三姑是童养媳,自幼被原生家庭抛弃,由夫家抚养成人。在古代中国,作为一种比较重要的婚姻形式,畜童养媳源于先秦媵制,宋元时期成为一种风俗,明清两代在民间相当常见,其目的是减少婚姻成本,增加劳动力。夫家和男方从中获益,但童养媳本人往往被虐待,命运大多很凄惨。幸运的是,冯玉吾少年经商,家道小康,冯氏父子也没有动辄打骂,侯三姑自然而然地接受了现实,不像苏戍娟那样有逆反心理。然而,侯三姑天生丽质,又聪明伶俐;未婚夫锦郎却容貌丑陋,胸无点墨,举止粗俗。侯三姑心生怨怅,乃人之常情,无可厚非。很有意思的是,冯家贴邻熊氏兄弟,一表人才,温文尔雅,又刻苦用功,志存高远,其读书声如玉振金宣,时时传入耳中。两种截然相反的青年男子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让侯三姑对读书人心存好感和敬意,见识迥异于锦郎,两人的差距愈加拉大。因此,她会当着冯氏父子的夸赞熊友蕙。冯玉吾精明又多疑,原本对侯三姑颇有提防,这下就更加担心,不仅加紧催促二人圆房,还吩咐儿子严加防范,自然更加重了锦郎的怀疑。侯三姑的悲剧在于,她心地良善,性情温顺,感于冯家的抚养之恩,又囿于命运、因果之说,纵然心中万般不愿,宁愿早早死去,也绝无背叛之意。然而,她并没有真正被夫家接纳,冯玉吾父子、过于执都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使她承受通奸弑夫的污名,受尽酷刑,差点被千刀万剐。

尽管侯三姑的物质生活优于苏戍娟,禀性也有差别,但内心一样苦闷,命运一样不幸。因此,在第十四出《阱泪》,当两位堪比窦娥的苦命女子在狱中相聚,很快便惺惺相惜,义结金兰。始而她们互相试探,确认彼此都是苦命人,为遭受共同的命运而悲叹。继而她们比较谁的冤情更

加深重，结果是一个“六月飞雪”，一个是“三年旱久”，真正是“受枉一般，陷罪无二”。接着，她们结拜姐妹。就在此时，刽子手以陪绑为名提取犯人。她们极度恐惧、悲恸，浑身颤抖，昏倒在地。醒来后，绝望、无助的她们想象刑场上天昏地暗、鬼哭狼嚎的惨烈景象，抱头大哭，相互安慰：黄泉路上，两人相依相伴，互相照顾，总好过孤魂野鬼在地府四处飘荡。面对残酷的命运，她们挣扎着发出了最后的呐喊：“风酸月黑西归候，送行旌敢劳郡守，值得你动地惊天，对付这一女流！”面对看不见，也摸不着，却将她们重重罩住的罗网，两个弱女子愤怒地叩问，矛头直指官府和官员，迸发出巨大的情感张力，令人心身震颤，大大强化了剧作的悲剧意味。

由上可知，在两位女主人公的人生历程中，导致她们陷入生存困境并无力自拔的首先是不公平的婚姻制度，然后才是不合理、不完善的司法制度，而她们由于遭遇困境而形成的性格又程度不等地促成了两桩命案的发生。倘若不把握这一点，则难以充分领悟剧作深厚的意蕴。从这一点来看，该剧不仅仅表现了寒门士子的遭际，也抒写了生命个体无力主宰自我命运的深长叹息。可见，婚姻制度是打开《十五贯》传奇的第二把钥匙。

### 三

打开该作的第三把钥匙是礼乐制度，具体表现为鬼神信仰和祭祀活动。鬼神信仰和祭祀活动，元明清三代的杂剧和传奇多有体现。该剧，对鬼神信仰的表现很常见，最引人注目的是“宿三”仪式和城隍信仰、源自酬神祭祖活动的拜香仪式和长生牌位，以及与信仰、祭祀密切相关的感恩文化等。

在中国极为复杂的神祇系统中，城隍具有明辨是非善恶的能力，是城乡的保护神，其功能主要是监察并辅助地方官吏，巡视治安，祭祀无主孤魂等。第十三出《梦警》，况钟上任苏州知府时，亲临当地城隍庙，举行名为“宿三”的祭祀仪式。结束后，他夜宿庙中，梦见两只熊各衔一鼠，案前长跪，似有哀泣之状；又将其官帽摘下，翻转一回。况钟担心已有冤情发生，打算留心察访。仪式中，他曾与城隍立誓：“从今日始，况钟或受一钱，或徇一私，神祇夺予算，褫魄使阳诛，犹如此血；若尔神不职，或雨暘失时，或灾患不恤，或冤狱不报，况钟当封你庙宇，绝尔血食。”城隍显灵，警示况钟，正是上述誓约的效力所致。

城隍信仰源于上古蜡祭，“齐梁史书已见其名，至唐始令天下通祀城隍，各立庙”<sup>①</sup>。明太祖朱元璋登位后，曾大封天下城隍，京师、开封、临濠、太平等地城隍为王，正一品；各府、州、县城隍则授公、侯、伯等爵位。又下令各藩国亲王亲自主持城隍的祭典；各府、州、县皆建庙，定期祭祀。据《（康熙）常熟县志》卷一三“城隍庙”条，在明代，“新官赴任，必先谒庙，与神立誓，期在阴阳表里，以安下民”<sup>②</sup>。又《（乾隆）夏津县志》卷五“城隍庙”条载，明洪武年间朝廷定制，“凡府州县新官莅任，必先斋宿城隍庙，谓之‘宿三’”<sup>③</sup>。《（光绪）榆社县志》卷九载明代李化龙《重修城隍庙碑记》云：“惟城隍一祠，上自京国，下逮州邑，罔不列之祀典，厘然备举。”<sup>④</sup>《（康熙）安庆府志》卷七《上任仪制》载录祝祷文如下：“今日谒神，特与神誓：神

①[清]岳浚等监修，[清]杜诏等编纂：《（雍正）山东通志》卷二一《秩祀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16页。

②[清]高士驥、杨振藻等修，[清]钱陆灿等纂：《（康熙）常熟县志》卷一三“城隍庙”条，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刻本。

③[清]方学成修，梁大鲲纂：《（乾隆）夏津县志》卷五“城隍庙”条，清乾隆六年（1741）刻本。

④[清]王家坊、葛士达等编：《（光绪）榆社县志》卷九“城隍庙”条，清光绪七年（1881）刊本。

率幽明，阴阳表里；予有政事未备，希神默助，使我政兴务举，以安黎庶。予倘怠政奸贪，陷害僚属，凌虐下民，神其降殃。”<sup>①</sup>《（万历）漳州府志》卷六《礼仪》“新官到任”条、《（万历）兰溪县志》卷三、《（顺治）清涧县志》卷二、《（顺治）宁国县志》卷二、《（嘉庆）禹城县志》卷一〇明司大观《修城隍庙记》等都有类似记载。可见，在明清时代，由于统治者的重视，城隍信仰正式纳入国家祭祀体制，成为地方社会公共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方志所录祝祷文的内容主要是官员向神发誓，恳请神的辅佐与监督。相比之下，该剧中况钟的盟誓更为明了、有力。他理直气壮地“威胁”神灵，体现了敬鬼神，尽人事的精神。剧中第十九出《廉访》，陶复朱经商回到无锡后即刻前往城隍还愿；而娄阿鼠听说况钟复审案件，惴惴不安，也到城隍庙求签，两人在庙前相遇。正好，况钟也微服私访到此，察觉娄阿鼠神情可疑，遂借助于拆字算命等方术与之周旋，终于套出游二被害的真相。可见，城隍信仰从公共领域延伸到私人领域，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深入人心的信仰提供了足够的依据，使得故事的发展顺理成章。

但是，剧中的城隍信仰也彰显了况钟前后表现的矛盾。第十五出《夜讯》承接《梦警》，是剧情转折的开始。面对四位面容哀惨悲苦，叫声凄厉欲绝的年轻罪犯，监斩官况钟高高地举起判斩笔，正要落下，看到犯由牌上罪犯的姓名，猛然想起前日城隍庙里做的梦，暗自心惊。他放下笔，询问案情，捕捉到多处疑点。秉持人命关天、爱惜人才的宗旨，他下令暂停行刑，并冒着丢官的危险，连夜求见顶头上司周忱，要求重审案件，一再表现出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非常难能可贵。然而，倘若仅仅体会到这一点，还不够，这出戏明显存在着不合情理之处。一方面，作者反反复复地强调他才能卓著，公正廉明，甚至将他视为包公转世，有日断阳夜断阴的超能。然而，在想起双熊之梦前，他的表现和过于执并无多大差别。直接将四位年轻人视为奸邪凶狠的罪犯，不容他们喊冤，吩咐差役剥去他们的上衣，严严实实地捆绑起来；又命令刽子手“须早把宝刀齐掣”，莫让勾魂的无常空自等待。直接促使他改变态度的只是一个梦，即来自神灵的警示。为什么作者要插入这一情节，难道仅仅是为了使剧情更加一波三折，增强剧作的传奇色彩，以此来耸动视听？当然不是。作者非常冷静、睿智，对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尽管况钟实有其人，以刚正清廉著称，曾三任苏州知府，受到百姓尊敬。但是，他耳闻目睹过太多的黑暗和不公，不相信现实中真有以民为本，为了伸张正义而不计个人得失的官员！一方面，他为底层百姓代言，表达政治清明，有冤必伸的理想；另一方面，他对现实又有着清醒的体认，产生了深深的无力感，唯有寄希望于神灵。

第二十五出所写的“拜香”，原是谢神礼佛的一种仪式。熊氏兄弟借用这一仪式，极为正式隆重地回报况钟的再生之恩。四月二十八日，药王诞辰，“有因亲病立愿者，是日以红布裹胫，赤足，右手焚香，左手携砖，匍匐翻之。自一步至五步，望庙而拜，名曰‘拜香’”<sup>②</sup>。知恩图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该剧却在《恩判》后接着叙写冯玉吾上门负荆请罪，兄弟二人参加乡试，并在中举后拜谢过于执。《拜香》放在了熊家兄弟双双考中进士，新授官职之后。作者这样安排情节，用意有三：其一，在明清两代，科举是最主要的人才选拔制度。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家族，金榜题名，为官入仕，都是非常重要的大事。所谓显亲扬名，光耀门楣，寒门士子熊家兄弟实现了科举时代读书人共同的梦想。因此，兄弟二人在上任途中前来拜谢恩人，更能彰显况钟的恩情之重、之深。其二，《恩判》之后，熊家兄弟虽然沉冤得雪，但因为忙于乡试、会试，内心的创伤一直没有得到疗治。《拜香》中，作

①[清]张楷等纂修：《（康熙）安庆府志》卷七《上任仪制》，清康熙六十年（1721）刊本。

②[清]吴慧元修，[清]蒋玉虹、俞樾纂：《（同治）续天津县志》卷八《风俗》，清同治八年（1780）刻本。

者写兄弟二人“三步一拜，一路号哭前去”，“痛肠难按，搵不住鲛珠无限”，实际上也是让他们痛痛快快地宣泄积淀已久的痛苦。因此，拜香既是谢恩之举，亦是疗伤之途。此后，兄弟二人彻底告别过去，开始新的人生。其三，《拜香》是《双圆》的前奏，不能缺少。唯有兄弟二人取道苏州，况钟夫妇和过于执才有机会合谋“骗婚”，形成最终的团圆结局。

第二十六出《双圆》，熊氏兄弟大登科后小登科，成为能臣况钟的女婿；苏戍娟和侯三姑在成为况钟的义女后，又厕身官家夫人。由于况钟夫妇的恩德，两对年轻人的境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况钟夫妇不仅膝下无女的遗憾得以弥补，美名四处传扬，更有熊氏兄弟提出为况钟夫妇立长生牌位。立牌位，原本是祭奠先祖与神佛的宗教活动；长生牌位则是为活着的恩人所立的牌位，其目的是为恩人祈福添寿。两对新婚夫妇“熏沐顶礼”，“愿云初百世公侯继”！从某一角度来说，况钟夫妇也达到了一种圆满。最后，况钟将所有的恩德都归之于神，带领众人“望空拜谢”。从拜神，到拜人，最后又回到拜神，在仪式的不断转换中，感恩文化和礼乐传统深度结合，很大程度上宗教化了。人们将感恩本身当成一种信仰，从中获得了莫大的慰藉，内心更为充实和笃定。

此外，剧中对鬼神信仰的表现还有不少，如第八出《商助》，商人外出做生意之前，先要入神庙祭拜。熊友兰在商船中掌舵，听到商人们议论弟弟的案子，急火攻心，昏倒在地。商人们认为遭遇此事，很不吉利，特意改变行程，重新入庙祷告。第十二出《狱晤》，兄弟俩倾诉心中的悲痛时，曾哭道：“遇春秋谁为祭设？”在中国古代，祖先崇拜深入骨髓。每逢春秋特定的日子，人们一般都要举行大型的祭祖仪式。

在以儒家为主，道释为辅的文化格局中，神祇信仰为什么能渗透到社会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实，上文所述城隍信仰发展流变的历程很有代表性，已经给出了答案。自上古以来，民间便有信鬼神、喜淫祀的传统。自周朝开始，中国实行礼乐制度，对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汉代以后，佛教和道教渐渐深入人心。唐宋以降，礼制下移。明清两代，对神祇的祭祀作为礼的一部分，是国家祀典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大明会典》云：“祭祀，国之大事，所以为民祈福。各府州县，每岁春祈、秋报二次祭祀，有社稷、山川、风云雷雨、城隍诸祠，及境内旧有功德于民、应在祀典之神，郡厉、邑厉等坛。到任之初，必首先报知。祭祀诸神日期，坛场几所、坐落地方，周围坛垣、祭器什物，见在有无完缺。如遇损坏，随即修理，务在常使洁净，依时致祭，以尽事神之诚。”<sup>①</sup>类似的文献不计其数，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借助礼乐制度不断加强儒道释三家的融合，促使神祇信仰逐渐强势占据人们的观念世界，深深制约着他们的言行、情感与思想。由此可见，神祇信仰经历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方式的互相作用与影响。一种信仰，往往兴起、流播于民间，受到统治者的关注与认可后，跻身国家正式祀典，更趋兴盛。民间意志与官方规制既互相对立、冲突，又彼此贯通、融合，正是在这一复杂的关系中，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发展演变。

综上所述，从《十五贯》传奇来看，在皇权社会，家族与婚姻制度是如影相随的大网，将芸芸众生笼罩其中。而礼乐制度，既是一张网，也是一副镇静剂。国家权力的强势干预有力促进了礼乐制度与神祇信仰的双向融合，产生了更为显著的影响力。这些因素相互配合，共同作用，再加上科举、司法等制度的维系，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古代中国人的性格和德行，也决定了他们的情感和观念、命运和境遇。作者对此细致而又生动的呈现，一方面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环境，使剧作的逻辑性和现实

<sup>①</sup>[明]李东阳等纂，[明]申时行等重修：《大明会典》卷九《授联到任须知一》，明万历刻本。

性大为增强,形成了奇正相生的审美风格;另一方面作者充分抒写了对社会与人生的体察,赋予了剧作丰厚深刻的思想意蕴。

## A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Legend of Zhu Suchen's *Fifteen Guan*

YANG Huil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Abstract:** Zhu Suchen's *Fifteen Guan* is not a legal drama, in a strict sense, whose focus is not on two unjust cases but lies in the individual life, especially the poor scholar's survival situation. What the author places in it is not only his concern for each other, but also his sigh for his inability to control his own destiny. By reflecting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of the clan, marriage, rites, music, and judiciary system, the work reveals in detail how these institutions shape the spirit and behavior of the ancient Chinese in the imperial era, their character and morality to a large extent, and determine their fate and circumstances.

**Key words:** *Fifteen Guan*, clan, marriage, rites and music

(责任编辑 赵林平)

(上接第 94 页)

## On the Ideological Analysis beyond the Psychological Analysis ——A Case Study of the “Despair” Analyzed by Kierkegaard

LUO Longxiang

(College of Social Development,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225009)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Kierkegaard, the Danish philosopher, analyzed the despair with a trace of strong psychological analysis. But his analysis is mainly an ideological analysis. Thereby also giving an illusion confused ideological analysis and psychological analysis to a certain extent. However, when we deeply understand his analysis, we will find that his analysis is profound, and it clearly reflects the ideological analysis beyond psychological analysis. After studying his analysis carefully, we can clarify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ideological analysis and psychological analysis. Furthermore, it helps us to understand deeply the importance and irreplaceability of ideological analysis.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alysis, psychological analysis, despair, philosophical curing

(责任编辑 陈 曦)